

大陈村访问记

观察家

总第 5790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摄影 安澈

◎张广星

随浙江媒体团到台湾参访,有一项行程是参访“大陈村”。我们要去的大陈村位于高雄市林园乡的北汕社区,村民大多是从台州大陈岛迁过去的渔民后代。

大陈村显得很破衰了。建筑简陋,拥挤,这些老大陈村人在这些简易房里已经住了几十年了。我看到一位穿着黑色对襟旧衣服的老人,从一扇矮小的被烟熏黑的后门里出来。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,90多岁了,一辈子打鱼。我从寡淡的人气感受到衰落之象:一是村里人很少,二是闲坐着聊天和在路上走着的人们都老了。几乎看不到一个年轻人。

年轻人要么到台北去了,要么漂洋过海到国外去了。这是北汕社区理事长王小林告诉我们的。当然,大陈迁台的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离开大陈村远出寻求发展,我的同事从台湾采访回来时也跟我说过,现在的大陈人后代已经遍布世界各地。这让我想到我们台州人的一个著名自喻。改革开放之后,台州人最早在本地创业,后来走向全国各地。在外创业的台州人中又有不少返乡投资。台州人自喻这种现象为“青藤经济”。迁台的大陈人也是生命力顽强的青藤。年轻一代当然不能固守老一代的小小渔船和种田的一亩三分地,他们应该拥有更开放的人生。

但迁台的第一代老大陈人就不同了。与王小林一起接待我们的莫老先生说,老了,他要回到乡亲们中间。在台湾,只有大陈村的老人中间,还说着同样的乡音。

当然,他们内心最重的故乡就是六十年前离开的台州和台湾外的大陈岛了。浙江省要组织他们回乡探访的消息,他们已经知道了,而且都非常期待。即使已经回去过的人,也想借着这次机会再回故乡看看。对于这些老人来说,每一次能回去的机会都是非常珍贵的。我也碰到几位50多岁的人,虽然他们从未去过大陈岛,但已从父母长期的念叨里熟悉了那个祖先生息的地方,他们也都想参加回乡探访的活动。我非常期待能在台州再见到大陈村民,就和王小林互留了电话。

我们到高雄大陈村这一天,时节上近冬至。台州人有个习惯,就是做冬至,吃冬至圆。冬至圆是一种糯米糕,圆形。冬至圆和其它荤素食品一起,摆在门前或屋后的一张小桌子上,再由主人摆上八个小酒盏,倒上黄酒,家人依次奉香祭拜天地和祖先。这就是做冬至的习俗。虽然冬至这一天还没到,但我看到,一家大陈人的屋后,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摆着八碗,而在旁边,太阳底下,一把破藤椅里,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。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台州人的一句老话:冬至长长节,做到年根歇。做冬至不一定就在冬至日这一天。我没有想到这个习俗在台湾大陈村还这么被珍视,被完好地保存着。

我向老人走去,向她问好,并问她这么早就做冬至了?老人听到我与她一样的口音,拉着我的衣袖不放。正在小桌子旁忙碌的中年妇女,老人的儿媳妇,赶紧拉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老人身边。老人告诉我,她是霞芷人,已经先后三次回过台州了。第一次是跟老信(台州话,老公)一起去的。第二次回去的时候,老信不在了,是儿子陪着去的。第三次家里去的人多,她指着跟前的媳妇说,她也去了。她说她和老信家都有很多亲戚,有在海门(今椒江),有在黄岩的,有在路桥的,都碰到了。

我在大陈村逗留的短短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,还碰到一位骑着自行车来的老妇人。她听说参访团里有一个台州人,就赶紧骑车来了。听她的口音,与我更近,我问她老家哪里。她说虽然她离开大陆的时候是在大陈岛,但老家其实是黄岩,那真是我的老乡了。我问她回过老家没有,她说回过一次。但她神情黯淡,说她所知道的家族前辈和与她平辈的老人们都死了,后辈们她一个也不认识,家乡从此之后只是心中的一种思念了。

在与大陈村乡亲们的交谈中,我体会到他们对家乡如此强烈的依恋,还有另一个因素,就是王小林说过的,台湾社会,尤其是在台湾南部,他们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。他们的命运就像浮萍一样,受着政治风云的波荡。王小林说,很多大陈村人并不一定会回乡养老定居,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在台湾,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台湾的生活,但大陆总是他们生命和情感深处的根源。他们强烈地希望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,他们在台湾的生活就能更有尊严。

记当过基层干部的父亲

往事印痕

一点一盏心灯

有所思

◎贺三阳

我的父亲并不伟大,他一生平凡,但也不太平凡。因为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当过基层干部。

我的家在北仑新碶镇,父亲在镇东街开了一家经营棉布、百货的小商店。解放后,政府看他为人忠厚老实,叫他当了镇工商联主任。于是,他带领广大工商业者,响应政府号召,带头认购公债,带头捐款支援抗美援朝,积极参加公私合营等。他还经常干一些与工商联工作关系不大的事,比如,每遇重大节日,他带着工商联成员在街上扎彩门、贴红、贴标语,增加节日气氛;又如,为了解决镇里小孩上中学难的问题,由工商联牵头,办了初中补习班,后来,在这个补习班的基础上建起了镇里第一所中学“新碶中学”,在《新碶中学校史》中有我父亲写的一篇文章,记录了办学过程。总之,在父亲任镇工商联主任期间,他把工商联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。

后来,镇政府决定成立新碶街道居民委员会,经广大居民民主选举,我父亲又当上了居委会主任。居委会主任事儿挺多,上要领会上级政策,下要体恤民情、民意,要管老百姓的油粮户口、邻里纠纷、夫妻吵架、街道的清洁卫生、“除四害”,甚至连夜晚边敲竹梆子巡夜边喊“小心火烛”也要管起来。俗话说: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”,我父亲就是这样一根针,他兢兢业业用这根针为政府、为老百姓缝补衣服。

镇里为了丰富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,决定成立业余越剧团。镇领导又看中了我父亲的组织能力,把团长这个

◎黄泽妍

莫言说:“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。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,这些故事,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。”今天,我也效仿一下文学大师,来讲讲我身边的诚信故事,这些故事,这些人,时隔许久,依然让我感念。

那还是前年十月份暴雨刚刚袭击姚城的时候,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,经过一夜倾盆大雨,水就要漫过台阶进入家门了,在厨房的妈妈突然“呀”的一声,“没煤气了!”这么大的雨,不知道村里代充煤气的老兴头还接不接活?妈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老兴头的电话,得知老兴头已经在车站装运邻村的煤气罐,就要出发了。得知我们家急着要充煤气,老兴头一口答应,说马上会上来收空瓶。

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老兴头还没来,水已经漫进了家里,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搬一楼的东西,正当爸爸要把空的煤气罐转移到二楼时,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家门口,是老兴头。只见他穿着油布雨衣,额发、脸颊都湿漉漉的,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,两条裤管也全湿了。老爸迎上去说:“哎呀,这么大水,你怎么

职务又安在我父亲头上了。于是,我父亲四处物色越剧爱好者当演员,找民间会敲锣、打鼓、拉二胡的高手组成乐团,千方百计拼凑起了一个业余越剧团。在那没有电视机、连收音机也不多见的年代里,一听“看戏”两个字,真是“铜锣一响,脚底发痒”。每逢剧团演出,观众把新碶小学挤得满满的。尽管翻来覆去演的总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包公铡陈世美》这几出戏,尽管经常出现演员忘了台词需要藏在桌子底下的人提示的现象,但台下的观众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

镇里的民间救火组织“水龙会”,由于长期缺乏管理,设备陈旧,人员老化,已经很难担当起消防救火的任务。镇政府决定整顿“水龙会”,但是缺乏资金。这时,镇领导又想到了我父亲,他工作责任心强,在镇里有一定威望,于是又叫他当了新的“水龙会”会长。我父亲兼任会长后,一边开始挑选青壮年义务消防队员,一边带人去上海,找在上海事业有成的同乡募捐。父亲用他的人格魅力和浓浓乡情,很快筹集到一笔资金,购买了新的消防设备,用机动水泵替换了手动水泵,大大提高了救火抗灾能力。他把“水龙会”门的钥匙挂在我家店堂中央的木柱子上,并给了还是小学生的我一个任务——如果他去外地出差或开会,晚上不在家时,叮嘱我不管天有多冷,只要一听到敲锣叫喊救火的声音,都要第一时间起床,取下“水龙会”门钥匙,打开店门,站在门外等消防队员来拿。他告诉我:救火如救命,一分钟也不能耽误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。他的观念和行,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还来啊,你家应该进水更严重吧。”老兴头嘿嘿一笑说:“答应着要来收的咋能不来呢,只是薪水桥那边不能走,绕道就耽搁了,放心,大卡车还能跑,傍晚一定给你们送到,不耽误你们烧晚饭啊。”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人,此时却说出了最动听的话。

傍晚,老兴头果真又出现了,双手举着一个小煤气罐的他,仿佛托举着一项神圣使命,庄严无比。我看到他的衣服下摆也湿透了,原来外面的水已经这么深了,而他举的小煤气罐并不是我家的煤气瓶,而是他家的备用煤气罐。非亲非故,为什么要蹚着这么深的水把煤气罐送过来呢?他的回答绝不浮夸客套,却简单得让我震撼:“早上说了,不会耽误你们烧晚饭的。”

不管时代怎么变,我相信诚信依然是大多数人所坚守的准则。中华美德,诚实守信,代代相传,是我们终身的信念。作为青年大学生,每一次考试前,我会庄重地在诚信榜上签下我的名字,因为是我郑重的承诺。行走在变幻莫测的社会,或许我们会被告知,各种欺诈算计着我们的诚信,可是,我依然相信大部分人像老兴头那样守住了诚,守住了信,这不仅是对承诺的坚守,更是对自身人格的坚守。

点一盏心灯,让我们的诚信之花怒放。

